

产业政策和产业补贴政策研究述评^{〔*〕}

卢现祥¹, 尹玉婷²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2. 江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从产业政策的制定动机、中外产业政策的比较研究与产业补贴政策的制度困境这三个方面, 梳理现有文献在产业政策尤其是产业补贴政策的动机、方式、效果方面的研究。可以发现, 现阶段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如何有效实施产业政策”, 而体制、制度及非人个性化关系交易方式的构建是影响产业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通过对产业政策及产业补贴政策对交易成本的影响、制度适应性效率的高低及政策实施方式的效果进行归纳发现, 产业政策及产业补贴对创新与竞争方面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 这就形成了产业补贴政策的制度困境。经研究可发现同样的产业政策及产业补贴政策产生不同结果的原因在于体制和制度。因此, 研究产业政策和产业补贴政策要重视体制和制度因素。

〔关键词〕产业政策; 产业补贴政策; 企业创新; 适应性效率; 制度困境

DOI: 10. 3969/j. issn. 1002 - 1698. 2020. 03. 016

“产业政策”是一种政府对经济, 尤其是产业发展相关问题进行干预的体现。由于经济体在每一阶段的发展状况存在差异, “产业政策”概念内涵与焦点也相应地发生过演变。自大萧条后兴起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更加注重提高有效需求, 如罗斯福新政中对扩大政府开支以刺激经济的主张, 产业政策更多侧重于对工农业的调整、支持与监督。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的产业政策主要是进行工业化与结构性改革, 如日本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发展赶超。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推进, 产业政策逐渐转向以市场导向为主, 在发展

中国家迫切地向发达国家学习经验以实现后发赶超的同时, 也实施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产业政策, 这一时期既有韩国飞跃, 也有拉美经济自由化改革的失败。新产业组织理论发展出的 R - S - C - P 分析范式能够更深入地揭示产业政策对微观经济组织影响的具体路径, 产业政策的范围逐渐覆盖了宏微观层面, 对经济实践的指导性越来越强。21 世纪以来, 全球价值链理论深入发展, 产业政策注重实现专业化与提升生产率, 新工业革命与可持续发展成为当下产业政策的主题, 以发展现代工业生态系统为政策目标。

作者简介: 卢现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尹玉婷,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界定、测度及降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 17BJL010) 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转型经济研究”项目(项目编号: 412/31510000048) 的成果。

综观国内外关于产业政策和产业补贴政策的文献研究有三大问题,一是制定产业政策的动机是什么?对于产业政策制定的动机,从微观层面看,政府干预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但在干预的同时也会出现政府失灵;从宏观层面看,发展经济学为如何运用产业政策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如何运用产业政策实现赶超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二是关于中外产业政策及产业补贴政策的比较,中外的产业政策和产业补贴政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市场化程度上的差异、制度上的差异以及人际化关系交易和非人际化关系交易的差异。三是产业补贴政策的制度困境。产业补贴政策的制度困境是指产业补贴到底是提高了交易费用还是降低了交易费用是不确定的,产业补贴是提高了适应性效率还是降低了适应性效率也是不确定的,此外,制度困境还表现在补贴方式的差异也会影响补贴的效果。

与国外产业政策相比,我国实行的产业政策沿袭了日本二战后的产业政策模式,以选择性为主,补贴、指导目录以及后续的审批制度是选择性产业政策的标配,而政府补贴是主要手段。从当今中美贸易战来看,既可以肯定我国前期实行的产业政策,也暴露出这样的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现行产业政策的发展弊端与不足亟待反思。因此,本文将厘清与产业政策和产业补贴政策相关的重要论述,重点探讨三大问题,即产业政策制定的动机、中外产业政策比较研究及产业补贴政策的制度困境,最后提出产业政策和产业补贴政策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一、产业政策制定动机

(一)关于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争论

自由经济主义认为“真正的知识是分散在社会每个个体中的”,个体默会知识的特性决定了分散决策的必要性,而政府作为一个“中央计划者”做出理性决策则需要高昂的信息搜集成本。在古典经济体系中市场信息是完美的,因此,充分依靠市场价格与竞争机制来协调资源配置、进

行消费生产决策是自由经济下的行为准则。^[1]然而由于现实经济并非是完全信息化的,还受垄断、外部性等影响,市场配置资源会失效,恰当的政府干预可以起到矫正市场失灵的作用,基于市场失灵理论,“产业政策”成为政府干预产业发展以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依据。^[2]而且,在当前信息革命催生了“知识经济”的背景下,市场在学习、知识积累和研究等领域不能产生有效率的增长,需要政府干预以缩小技术差距、提高生产力。^[3]

但是,政府的不当干预同样会造成政府失灵,使得产业政策无效,因为现实市场经济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样会使得政府对资源的再分配无效,公共选择学派将这其中的机制解释为政治俘获。基于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产业补贴是一种典型的再分配手段,这种政府支出属于“以特殊政策给予特定群体的再分配”,因此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特殊利益政治问题,尤其是游说与谈判。^[4]拉丰认为产业政策可以被看作是在对效率和信息租金之间进行权衡的结果,并利用一个公共品模型分析了宪政是否应当授权政治家制定产业政策、应当选择哪种所有权性质的企业来提供公共品、如何防止监管机构被俘获等问题,对我国补贴的裁量权,授予对象和设租、寻租等问题具有重要启示。^[5]根据新规制理论,“中央—地方”“政府—企业”等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是影响产业补贴有效性的关键因素。在对我国现实的具体研究中,杨帆、卢周来分析了中国房地产开发商这一特殊利益集团,是如何利用中央和地方关系中的税收行为俘获地方政府,致使中央政府的监管、调控失败的。^[6]孙早、席建成肯定了发展中国家实施产业政策具有现实合理的意义,并利用多任务的委托—代理模型考察了“中央—地方”“政府—企业”这两组关系,揭示了地方政府的双重目标,以及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进程的差异是如何影响中国式产业政策实施的。^[7]

(二)关于产业结构升级与后进地区发展的争论
对“政府导向型”发展模式的研究反映了发

展中国家运用产业政策实现结构调整与赶超的发展目标,产业结构理论与发展经济学在这方面做出了贡献。基于产业结构理论的视角,对产业政策的讨论主要是探究政府干预能否实现产业结构的变化,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在实证方面学者们具体地探究了补贴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变动,张同斌、高铁梅借助 CGE 模型的数值模拟发现,当高新技术产业获得财政激励时,会大大带动其前、后关联产业的发展,如会刺激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的产量增加。^[8]宋凌云、王贤彬认为政府补贴会在短期内显著地加快产业结构变动。^[9]王宇、刘志彪借助特定要素下的一般均衡模型发现,产业补贴所引致的增长实际上是以另一产业的萎缩为代价的,产品补贴实际上通过工资效应造成了低端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的转移。^[10]韩永辉等实证检验了产业政策对地方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的影响,肯定了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政府干预的积极作用。^[11]

以林毅夫为代表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强调如何运用比较优势在区域贸易中发展产业,他们总结了世界各经济发展趋势的融合过程,指出我国需要调整自身产业结构去应对新的增长极带来的发展困境,办法之一就是使用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利用产业政策扶持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12]然而 Wade 认为林毅夫在其理论中并没有详述政府如何甄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而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13]相较而言,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从其他方面研究了后进地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后发赶超的重要路径,如 Amsden 的后进地区发展理论关注后者如何更快速地介入产业链、促进产业升级,^[14]瞿宛文将产品周期理论运用到变化迅速的高科技产业中去探寻促进产业发展的主要变量。^[15]

伊斯特利指出传统产业政策的“技术官僚型”发展带来的增长尽管显著却是不可持续的,若完全复制这种发展方式会使得人们只关注那些技术上的缺陷,而忽略问题的根源即制度上的不足。^[16]现阶段研究肯定了发展中国家进行政

府干预以实现经济发展的必要性,但干预的手段应当是重点讨论的问题,也即讨论相应政策制度的设计与完善。

(三) 国际分工与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盛行于 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上半叶。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推动了产业政策理论的兴起和传播。二战之前不少经济学家赞成产业政策。二战之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国际分工和贸易体系,却持反对意见,提倡各国分工的不断细化,各国经济的深度融合,对旨在通过产业政策追求本国经济扩展基本上持反对的态度。文贯中强调利用比较优势的前提是要遵循开放贸易的规则,不能以弱势锁国为由借助产业政策发展经济。^[17]一些西方学者反对产业政策的理由如下:首先,产业政策必定由政府扭曲市场信号的前提下强制推行,如会扭曲成本、价格及激励机制。由于干扰或限制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机制的作用,产业政策成功的很少,浪费了很多经济资源,例如搞进口替代的拉美国家和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其次,大国推行产业政策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优势。大国可通过封闭本国市场,提供政府津贴,使本国受保护的特定产业获得规模报酬递增的好处。在获取行业优势(即平均生产成本变得最低)之后,进军世界市场时,就能所向无敌,因而明显影响别国利益;第三,一个各国高度开放,建立基于比较利益之上的国际分工和相互高度依赖,共同享有全球规模报酬递增好处,实现良性全球化的世界,相较一些大国各自为政,在产业政策的干预下,只许本国企业穷尽本国范围内的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权,从而建立对他国的行业优势这样一个恶性竞争的全球化的世界而言,自然前者更为和平、安全,也更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二、中外产业政策比较研究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 2018 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世界上实施的产业政策分为三类,即积累型、追赶型与新工业革命驱动型,这种

分类主要基于表 1 所示的四个维度。平新乔对狭义产业政策的理解与上述的积累型产业政策相似,同时混合了新工业革命的特点,如支持赶超的关键技术、具体项目,并实施贸易保护。他进一步指出,英、法、日、德等国家都先后运用产业政策来支持其自身市场体系的发育和扩张,一般随着产业的发展成熟,狭义的产业政策就应该慢慢淡出,以竞争政策取代狭义的产业政策。

表 1 定义产业政策的维度

	积累型	追赶型	新工业革命驱动型
聚焦特定部门程度	大多垂直,聚焦特定产业	大多横向,结合针对多个产业的目标	大多横向,有特定产业的新元素
政府干预程度	更偏向于政府引导	更偏向于市场引导,重点在于支持性要素	混合,重点在于保护和支支持新产业和 PPP 项目
对外部竞争开放程度	有选择性的逐渐开放	聚焦外部竞争力	大多开放,但会保护战略技术
出口导向程度	国内和区域需求驱动	出口导向,全球价值链整合	混合

资料来源:摘自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8,

UNCTAD, Table IV. 5, p. 145。

对中国产业政策和产业补贴政策的争论与对中外产业政策和产业补贴政策的混淆是有关的,中外的产业政策和产业补贴政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市场化程度上的差异。对于市场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或地区,产业补贴政策并不会直接影响生产效率,而是引导了资源的流动。Cerqua & Pellegrini 采用 RDD 模型方法对意大利区域政策法案 L488 进行研究,发现,补贴对就业、投资和人员流动的影响是积极的,而对生产率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18]而 Bernini 等人进一步分析了该法案下的补贴对企业 TFP 不同组成部分的影响,认为货币补贴在短期内对 TFP 有负面影响,但在 3—4 年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9] Criscuolo 等人利用英国实施的“区域选择性援助”政策考察政府资助对制造业的影响,结论表明补贴对就业、投资和净入境有正向的处理效应,但对 TFP 不存在效应。^[20] Yi 等人建立了一个动态博弈模型,将补贴分为生产、投资、进口三类,考察三者的成本效益效应与投资诱导的影响程度,并考虑了美国乙醇工业的标准对这些变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投资补贴和进口补贴比生产补

贴更划算。^[21]美国、德国、法国和芬兰等国产业政策的成功也证明了政府干预在知识经济中的重要作用。^[22]

但是市场化程度不高和市场力量不够强大的国家,产业政策和产业补贴政策却出现了另外的特征。如中国的市场机制不够强大,补贴政策更容易引起资源错配现象。^[23] 瓦尔德纳研究指出典型的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如土耳其、叙利亚,其农业市场、信贷市场面临严重的国家干预,补贴规模很大,1981 年叙利亚价格控制和补贴制度的总成本(包括给公营部门的转移支付)相当于 GDP 的 7%。^[24] 受政策补贴的群体无需采取集体行动便能够得到政府官员提供的物品,集体行动的困境维持了无效率的经济制度,这正是支持一庇护主义治理逻辑的体现,社会中的权利限制秩序比较显著。中国与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大规模的补贴等,以再分配为导向、强调消费而非发展的资源重新配置追赶型经济制度,^[25] 会促进食利阶层的形成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制度之弊影响深远。当然,放弃产业政策无异于因噎废食,拉美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力证了这一思路。^[26] 因此,如何使我国的产业政策发挥其应有作用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待从体制层面进行深入研究。

二是不同发展阶段适用不同类型的政策,实施效果是根据政策实施的制度安排与制度条件共同决定的,如日本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就停止了高速增长,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日本的政治家和官僚在后期仍然倾向于采纳产业政策而非竞争政策,进入壁垒的累积和竞争的缺乏大大降低了经济组织的开放程度。^[27] 由计划经济时期开始的产业政策帮助我国完成了工业体系的建立,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 40 年的快速发展,但是在新时期市场机制亟待完善的背景下,“家电下乡”“发展新能源汽车”等项目中“骗补”问题频发,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让我们急需反思产业补贴政策的扶持逻辑。即使相同的政策类型却有不同的政策效果,这应当从制度方面深

入分析原因。我国产业政策承袭了“东亚模式”的发展经验,而 Chu 认为东亚模式中的产业政策与我国的重要差别在于政治程序上的不同,东亚模式中的主要国家是“两层级”模式,经由官僚机构直接面对产业,地方政府少有涉入,这种模式下嵌入式自主的治理模式得到比较充分的运用。^[28]我国是多层级模式,表现为中央与地方实施产业政策的目标不甚一致,多种目标排序中的优先程度也不一致,由此导致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进一步放大了本身存在于核心组织中的人际化关系交易范围的问题,带来寻租等一系列弊端,更容易导致经济资源的圈层性增大即有限准入秩序形成,降低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29]制度质量制约着产业政策和产业补贴政策的效果。我国产业政策和产业补贴政策带有有限准入秩序的制度性特征。顾昕也认为我国产业政策执行有待行政治理、市场治理和社群治理的协调运作,应当推进市场强化型和社会增强型政府转型。^[30]

三是人际化关系交易和非人际化关系交易的差异。这方面的差异可以更好地看出中外产业政策与产业补贴政策的差异。由于历史及体制方面的原因,我国人际化关系交易影响了我国的产业补贴政策。深入讨论成功的产业政策所需要的制度基础,非人际化关系交易不可或缺。^[31]Levy 认为政府在干预大公司生产活动过程中无可避免地会发生非生产性扭曲,如寻租和腐败,但所幸韩国政府比较强大,避免了大部分特殊利益集团对私人经济部门的蚕食。^[32]约翰逊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较为成功地运用产业政策实现经济发展,而没有过多地受到通产省及其产业政策带来的政府失灵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因为日本的政治腐败多发生于党派组织中,而与企业、市场联系密切的行政系统较为廉洁,因此寻租的负面影响较小。这主要得益于日本企业与市场之间的非人际化关系交易。^[33]Boyd 指出日本在产业政策时期支持结构重组战略,产业政策中的租金主要用于诱导企业组建卡特尔组织,因此日本企业不能只盯着租金的分配者,他们更需

要紧跟市场,其寻利性远远大于寻租性。^[34]由此可以看出,产业政策的出发点应该是扶持市场而非扶持企业,^[35]然而中国在扶持产业发展的同时却表现出了严重的“裙带共产主义”倾向,^[36]以至于当与企业的政治联系越紧密,补贴越容易对该类企业的盈利能力、税收和就业创造(社会绩效)产生负向影响。^[37]因此,尽管政治程序在国家间有所不同,但影响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关键因素应该都存在于各国政治、经济组织中的交易关系中,保证非人际化关系交易在核心组织内部的稳固,对于提升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重要意义。^[38]Rodrik 对“嵌入式自治”的倡导更加指明了产业政策的实施有赖于政治组织内实现“非人际化关系交易”,拉美与东亚的差距源于拉美国家政策的协调一致性与实施连贯性程度不足,即它们的顶层设计存在缺失,而过度“嵌入”又可能恶化寻租问题,^[39]政府如何依据一定的规则对经济行为进行干预,如何使得遵循市场规律与发挥政府的主观能动性达到一种平衡,构建“非人际化关系交易”网络对于把握好“嵌入式自治”与“主动干预”的尺度具有重要意义。上述研究可知,受人际化关系交易的影响,寻租倾向不同,社会经济组织的开放程度有所不同,由此形成了社会经济的有限准入秩序与开放准入秩序状态的不同,不同类型的产业政策在这些不同程度的秩序中产生的效果亦会不同。

三、产业补贴政策的制度困境

如前所述,一方面从国家发展的角度肯定了产业政策实施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从政府失灵的角度探讨了产业政策实施的局限性,因此当前有关产业政策的研究方向集中在如何提升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上。财政补贴属于直接干预型支持手段,一般通过两类途径影响企业资本投入:研发投资杠杆作用(研发补贴)、促使企业扩大投资规模(产品补贴),因此对企业的绩效评价主要与创新能力^[40]、盈利能力和生产率^[41]有关。但同时,由于现实经济的复杂性,影响因素的传

导机制不可能得到完备表述,因此不同政策工具对不同政策目标的效果都会因为分析影响机制的不同视角而得到不同的结论。产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是政治企业家们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中受到的激励和约束,来源于政治、经济利益集团间的博弈,经济发展不一定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导向。^[42]因此,本文试图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总结现有研究的贡献,并分析产业补贴政策的制度困境与改进。

(一)制度困境之一:是提高交易费用还是降低了交易费用

产业补贴政策的制度困境是指产业补贴到底是提高了交易费用还是降低了交易费用是不确定的。Levy 论证了中国台湾与韩国制鞋业产业政策的实施是以降低交易费用为目标的,他经过田野调查发现虽然两地都是出口导向型政策,但由于韩国初始市场交易效率比中国台湾低,所以政府的干预更多是为了促进企业进入与扩张,以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加快经济发展,从而也解释了为何相似的、成功的产业政策却有不同产业结构演变,据此反驳了企业规模、产品组合等假说。该项研究表明,在研究产业政策时,从降低交易费用角度出发或许能得到更贴近现实的答案。刘海洋等指出补贴会诱使企业产生过度购买行为,他们借助讨价还价模型证明了这一命题,并采用我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以 PSM—DID 方法测算了我国受补贴与未受补贴工业企业的购买成本差异,验证了补贴降低了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从而增加了企业的购买成本。^[43]我国产业政策指导目录的建立实际上增加了繁杂的审批程序,^[44]而建立行政审批中心又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创新。^[45]

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现状中维持政治联系尤其需要企业进行社会资本投资,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非正式制度(文化习俗)与正式制度安排缺位导致的,^[46]社会资本(捐赠、寻租)本质上是企业构建关系网络的交易费用。肖兴志、王伊攀利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多阶段最

小二乘检验,发现若政府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同等条件下进行了社会资本投资的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会比其他企业多近一半。^[47]有两种因素会加大社会资本型交易费用。一是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偏高。要素市场扭曲程度高的地方,政府对要素定价和分配的控制权大,使得企业从政府补贴中获取创新资源的交易成本增加。二是信号机制的作用。获得政府财政补贴是一种被政府认可的信号,在不完全信息市场上,这种政府财政补贴可以起到向私人投资者传递利好投资信号的作用,进而帮助企业获取所需额外资源,企业为获得这种信号会适当增加政治联系,加大社会资本投资。^[48]

考虑到更完备的市场参与者,Acemoglu 构建了劳动力、中间部门和两个精英阶层的模型,并假设其中一个精英掌权,创设经营壁垒,浪费了社会的产出。该模型揭示了税收手段表面上能促进资源合理分配,实际上会导致更昂贵的政治斗争代价,社会资源损失更不可估量。^[49]这些研究都揭示了不合理的补贴带来的寻租耗损会产生大量的政治型交易费用阻碍经济的发展,从而进一步揭示了政府失灵的实质。

(二)制度困境之二:是提高适应性效率还是降低了适应性效率

制度困境之二是产业补贴是提高适应性效率还是降低了适应性效率也是不确定的。似乎提高了配置效率,但是否降低了适应性效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某项制度或政策的创设是否有意义,不仅取决于其对资源的静态配置效率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看其所产生的适应性效率程度,概括地说就是要考察该项制度对市场参与者获取知识、引发创新、敢于创造和冒险的意愿,以及解决随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社会问题与瓶颈的调节能力,也即制度能够抵御经济系统风险,实现自我调整与纠错的能力。^[50]现有研究中,产业政策及其手段本质上在发挥着风险承担的作用,能否很好地发挥风险分担机制,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也被视作衡量产业政策及其手

段有效性的指标。^[51]在市场经济中,这种能力通常是通过创新与竞争的支持来实现的。传统的产业政策意在鼓励特定产业内的创新,而产业政策中的竞争政策则是鼓励资源在部门间转移。

1. 产业补贴政策对创新的影响

创新是驱动经济的重要因素,而研发补贴对企业、产业创新产生怎样的影响,大量学者在这个议题上做出了贡献。如Boeing研究指出经常获得R&D补贴的企业其挤出效应并不明显,而挤入效应会随时间而消失;^[52]Boeing和Mueller研究指出中国民企从研发投入中获得的回报高于国企,同时也再次说明补贴对产学研的促进效应是微乎其微的。^[53]然而,邓若冰、吴福象认为尽管“挤出效应”不存在,但“挤入效应”是显著的,他基于产品质量提高型创新视角,将技术溢出水平、产品水平差异与垂直质量差异等因素一起纳入三阶段动态博弈模型的分析框架,研究表明,政府补贴有利于提高企业R&D投入的积极性与社会福利水平。^[54]王刚刚等利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PSM匹配法研究发现政府R&D补贴本身就具有认证信号,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外部性融资从而增加研发投入。^[55]

但是,也有学者研究分析了补贴对创新的负面作用。Mariko和Cho分析了韩国在创新方面落后于日本的原因,发现韩国实施的保护性产业政策会拖延主要财团进行技术创新,并会鼓励其对自身技术能力的重复,从而无法促使经济组织的研发规模、共享机制与研发联盟达到日本的水平。^[56]Acemoglu等人构建了企业层面的创新、生产率增长、内源性进入和退出的再分配模型,特别地设定了不同创新能力的高低类型的公司特征,更符合现实经济状况,经研究发现,对研发或经营进行补贴的产业政策会减少经济增长和福利。^[57]汪秋明等通过一个动态博弈分析说明了企业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以获得补贴是一种理性行为,但大部分企业不会将资金投入生产中,^[58]周亚虹等也对此做了说明,支持了补贴并不会促进研发投入的结论。^[59]Hu等人利用中国

2007—2011年数据,验证了我国专利数量与企业研发投入以及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正向关系较弱,专利涌现这一现象更可能是政府激励政策推动的结果,而非企业生产技术日益成熟的表现,再次反映了政府激励机制的扭曲。^[60]Chen等人研究我国IT行业的IPO绩效,发现研发补贴对绩效存在倒U型效应,而非产生正向影响,表明非研发补贴相比研发补贴更具有融资信号,该结论比王刚刚的研究更为深入可信。^[61]

2. 产业补贴政策对竞争的影响

产业补贴能否支持良性的市场竞争以达到最优资源配置的目标呢?现有研究认为,财政补贴可以在各类要素资源的再配置过程中发挥作用。首先,市场份额再配置方面,Aghion等人实证检验了尽管贷款、收取关税对强化企业内部竞争提升绩效方面的效果没有补贴和减免税收优惠手段显著,但更能激励市场份额集中配置于创新能力强的企业。Kalouptsi考察了政府补贴下的中国造船厂对世界市场的影响,构建了造船厂与船主的行为方程的动态模型,得到成本函数,并考虑补贴的情况,通过报告数据实证得到成本的变化。补贴的确造成造船厂成本下降13%~20%,导致了生产份额在世界主要厂商间的重置。补贴还导致成本与生产的错配,使得托运人获得小幅盈余。^[62]其次,市场资源再配置方面,孔东民等讨论在金融体系、产权保护滞后的低市场化程度地区,财政补贴能够显著提高被补贴对象的资源竞争优势。^[63]这与Aghion等人的研究趋同;市场竞争度越高,财政补贴作用发挥的效果越明显。宋凌云、王贤彬肯定了产业政策在资源重置方面的作用,认为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比没有受到支持的行业在增加就业、企业增加值以及投资方面都有显著效果,并认为产业竞争度越高,产业政策的效果越显著。^[64]

然而,也有研究认为补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错配现象。张杰认为补贴与竞争两种手段对于出口产品质量的作用效果相背,即补贴不能如市场导向一样有效率地配置资源。Wei等

人在专利和创新方面比较了国内外申请书、批准率、引用率、人力投资等方面的差异,肯定了中国取得的成就,同时也指出了在所有权方面存在创新资源错配的现象。^[65]李旭超等利用中国企业数据实证分析表明规模扭曲系数与生产率负相关,高效率的企业因“约束”而无法长大,低效率的企业因“补贴”而不合理膨胀,资源错置削弱了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学者在研究的同时还关注到补贴对市场竞争的破坏。孟辉、白雪洁基于H&K模型推导静态一般均衡发现,产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主要是由政府扶持与地区间竞争所引发的投资扩张导致的。^[66]

补贴会大大破坏原有市场的竞争力。Blonigen利用1975—2000年国际钢铁行业的数据分析了行业政策对其他行业出口竞争力的削弱作用,发现钢铁产业政策增加一个标准偏差,会导致处于其下游的制造行业的出口竞争力下降3.6%。^[67]但是在钢铁作为主要投入品的行业,产业政策对其产生的积极影响高达50%。陈小亮、陈伟泽构建了含有垂直生产结构和利率管制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发现亏损国企凭借垄断地位挤占了非国企在上游行业的投资空间,还抬高了中间品价格,非国企在下游行业的投资动机因此被削弱。^[68]徐志伟、郭树龙指出高行政壁垒和补贴对象的歧视性选择使得政府补贴具有较强的反竞争效应,高强度的政府补贴由于高行政壁垒限制了潜在企业市场进入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在位企业的盈利水平,但补贴促进技术进步的效应并不存在。^[69]

补贴还会导致产能过剩的发生。江飞涛、曹建海指出补贴会扰乱市场竞争,破坏退出机制,造成退出障碍和产能过剩问题。^[70]江飞涛等建立了一个两期博弈模型说明补贴、贷款等行为会导致企业自有投资行为过低,风险外部化,扭曲了企业的投资行为,引发产能过剩。^[71]卢现祥认为我国特殊的产能过剩的形成部分来自于政府不合理的激励政策的引导,并对动漫产业的补贴政策与绩效进行分析,表明我国政府现有的投

资、补贴政策会令创新的激励机制扭曲。^[72]

(三)制度困境之三:补贴方式的差异及其影响

制度困境还表现在补贴方式的差异也会影响补贴的效果。在补贴制度上,补贴的事前性与事后性对绩效影响的差别很大。黄先海、谢璐利用博弈模型和数据模拟法对R&D补贴的“事前给定补贴率”与“事后根据R&D投入给定”两种补贴策略进行比较,认为“事后性”策略更有利于节约资源、避免寻租,从而“事后性”策略能够产生更大的社会福利。^[73]郑绪涛、柳剑平进而指出事前性的R&D补贴主要弥补企业从事R&D活动时信息溢出所带来的损失,而事后补贴则主要解决市场结构导致创新产品竞争的不充分而带来的生产不足问题,因此可以采取“事前性”与“事后性”搭配的策略组合。^[74]

Junichi和Hiroyuki利用日本政府的产业集群政策研究了直接研发支持与间接网络/协调支持之间的差异,认为间接型支持扩大了产学研政府网络,且对产出有广泛而强烈的影响,而直接的研发支持只会产生微弱的影响。^[75]2018年,他们又采用问卷调查数据研究了日本MEIT与MEXT两种不同机制的补贴政策对所支持的项目绩效的影响,运用GMM和IV—Probit模型方法研究发现,“自下而上”的补贴机制可以使公司有坚定的承诺以促进项目取得良好绩效。^[76]另外,熊勇清等以光伏产业为例,构建斯塔伯格模型并进行数值模拟,从“供给端”与“需求端”比较视角分析了财政补贴适度偏向“需求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77]

财政补贴的不同工具对企业的绩效影响也会产生差别。Bérubé和Mohnen采用加拿大创新调查公司的数据对只使用税收抵免和使用税收抵免以及赠款两种方式的政府创新补贴的效果进行分析,发现政策组合对研发的激励更大。^[78]Aghion等人以我国的数据分析了与市场竞争程度有关的四种财政补贴方式(直接补贴、税收优惠、关税、贴息贷款)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认为

前两者在竞争状态下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要优于后两者。张同斌、高铁梅利用CGE模型得出在高新技术产业产出增长方面,直接补贴等政策比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增加值增长。而唐书林等基于创新驱动演化模型认为税收优惠对创新的激励要优于直接财政补贴,而政府补贴会造成资源配置扭曲,企业高管持股比例越大,企业的创新激励越被扭曲。^[79]柳光强利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数据验证了税收优惠、财政直接补贴政策在不同产业之间、不同政策目标之间的激励效果存在明显差异。^[80]Nie和Yang利用博弈模型分析了产出补贴与固定补贴的影响,结论证明产出补贴实现了更高的消费者剩余和较低的生产者剩余。^[81]

不同的补贴强度也会影响补贴绩效。邵敏、包群以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统计年报》公布的数据,使用广义倾向评分匹配法估算不同补贴水平对企业生产率产生的差异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对企业的补贴力度存在一个临界值,超过临界值的政府补贴无法有效提高企业生产率水平。毛其淋、许家云采用PSM—DID模型方法评估了政府补贴对企业新产品创新的微观效应,结果发现,只有适度的补贴才能刺激产品创新。张辉等利用门槛回归模型验证了补贴对研发投入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这意味着补贴具有合理区间。^[82]

补贴调整不仅应当体现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之中,也应当体现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之中。Hausmann和Rodrik认为应在新兴产业发展初期对私人企业的试错性进入进行补偿,当模仿型企业增加后,应当及时对政府补贴进行规制和清理,使产业合理化。^[83]王宇、刘志彪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补贴对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影响,指出了补贴对经济增长作用的不可持续性,以及补贴绩效随产业阶段交替而变化的特征,支持对补贴进行动态调整。周亚虹等以新能源产业为例,实证发现了随着产业扩张,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会降低,同时还会导致

同质化产能过剩。

产业补贴还应基于行业异质性而实施不同政策措施,柳光强分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下6个子产业在税收优惠与直接补贴两种手段下的激励效应,得出直接补贴政策对高端装备、节能环保及信息技术产业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其他行业作用不显著甚至起反向作用,而税收优惠政策对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技术产业具有不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其他产业具有不显著的促进作用。按文件进行划分,学者们按照政府出台的产业扶持文件划分了重点鼓励与一般鼓励行业,或者支持与非支持产业。从行业特征来看,黄先海等利用拓展的“2×2”伯川德模型得到“行业竞争程度”的异质性特征,并结合新结构经济学中“行业资本密集度”的行业异质性特征对行业做出区分,以这两种特征构建了能够使得补贴发挥最大效果的产业政策实施空间,并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加以验证。^[84]

四、总结与展望

本文从产业政策的制定动机、中外产业政策的比较研究与产业补贴政策的制度困境三个方面,梳理了现有文献在产业政策尤其是产业补贴的动机、方式、效果方面的研究。动机方面主要与每一阶段经济发展主体相关,从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讨论转到对产业结构升级、后进地区实现赶超的讨论,现阶段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到“如何有效实施产业政策”,于是本文基于制度比较逻辑,对中外产业政策的相关研究进行文献梳理,认识到虽然制度差异会导致政策运行差异,但关键因素在于核心组织内部的非人性化关系交易方式的构建,它能够帮助政治经济组织抵御寻租、利益集团蚕食等问题。

进一步地,具体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对产业政策实施方式与效果进行总结,即从政府干预带来的交易费用、制度适应性效率及政策实施方式的效果进行归纳,发现现有研究的分歧在于补贴对创新与竞争的影响既存在积极因素也存在消

极因素,尤其是对补贴资源的配置效果的考察结论不一,不同补贴方式绩效也不一样,也就是产业政策及产业补贴政策形成的制度困境。这是本文对现有国内外相关文献梳理中的发现。总的来讲,本文的两大意义在于,一是对中国产业政策和产业补贴政策的争论与对中外产业政策和产业补贴政策的混淆是有关的,我国的产业政策和产业补贴政策在市场化程度、制度及人际化关系交易与非人际化关系交易上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是有较大差距的。欧美国家产业政策是对市场失灵的一种校正,而我国产业政策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范围上都超过了欧美国家,用阿西莫格鲁的话讲,我国是一种资源重新配置追赶型经济了。二是从制度困境的角度看,长期以来,我国的产业政策及产业补贴政策是不利于创新、竞争和适应性效率提高的,因此,在我国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过程中,应该及时调整我国的产业政策及产业补贴政策,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

现有研究在以下方面也存在值得进一步讨论与完善的空间。第一,国内对特殊利益集团进行分析的文献不多,而在我国产业发展中“部委带头”模式凸显,鲜有文献分析产业补贴中这一现象,值得让人思考的是,在我国政体下,部委领导的产业利益集团如何就有限税收资金拨付促成谈判?而在产业获得补贴政策许可后,相应的补贴资金最终流到了既定的地方了吗?现有文献尚且无法对这些问题给出合理解释。第二,大多数文献主要讨论了补贴方式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将补贴方式主要分为两类:直接补贴与税收优惠,但是并没有深入分析这两种方式所刻画的补贴制度,及补贴制度持续低效的深层次原因。吴敬琏等学者提出“功能性”与“选择性”产业政策的区分,能够较为深入地刻画我国现行补贴制度的特征,并指出“功能性”产业政策的积极意义,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实证研究,无法深入阐释这一政策的重要意义。^[85]

总之,如何设计、实施一个好的产业补贴政

策是亟待研究的命题,而好坏的定论需要有一个合理的标准来进行判断,在研究过程中这一标准实际上随着各个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而有所不同。本文认为,现阶段从制度视角去考察这些问题,以制度效率的标准去评价一组政策的效果能否较为契合经济发展的要求,未来的研究不仅要在合理的产业政策能否维持较高的制度效率上得到理论完善与实证检验,还需要有更为具体的政策设计与实施指导。

注释:

[1] von Hayek F. A.,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45, XXXV(4).

[2] 平新乔:《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政策》,《中国经济报告》2016年第12期。

[3] Stiglitz J. E., Lin J. Y. and Monga C., “The Rejuvenation of Industrial Policy”,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13, WPS6628.

[4] 参见[瑞典]T. 佩尔森、[意]G. 塔贝里尼:《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解释》,方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5] 参见[法]让-雅克·拉丰:《激励与政治经济学》,杨小静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6] 杨帆、卢周来:《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如何影响地方政府决策——以房地产利益集团为例》,《管理世界》2010年第6期。

[7] 孙早、席建成:《中国式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产业升级还是短期经济增长》,《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7期。

[8] 张同斌、高铁梅:《财税政策激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研究》2012年第5期。

[9] 宋凌云、王贤彬:《政府补贴与产业结构变动》,《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4期。

[10] 王宇、刘志彪:《补贴方式与均衡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与传统产业调整》,《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8期。

[11] 韩永辉、黄亮雄、王贤彬:《产业政策推动地方产业结构升级了吗?——基于发展型地方政府的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经济研究》2017年第8期。

[12] Lin J. Y., Rosenblatt D., “Shifting pattern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rethinking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 2012, 15(3).

[13] Wade R., “After the Crisis: Industrial Policy a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Low - Income Countries”, *Global Policy*, 2010, 1(2).

[14] Amsden A. H.,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s limited by the type of market: The case of the Taiwanese machine tool industry”, *World Development*, 1977, 5(3); Amsden A. H., Lagrue J.,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s Limited by the Rate of Growth of the Market: The Taiwan Machine Tool Industry in the 1970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5, 9(3).

[15] 瞿宛文:《如何研究中国产业:多种理论资源综论》,《人文杂志》2018年第12期。

[16] 参见[美]威廉·伊斯特利:《威权政治:经济学家、政策专家和那些被遗忘的穷人权力》,冯宇、邓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

[17] 文贯中:《重新审视产业政策》,爱思想,http://www.aixiang.com/data/114626.html。

[18] Cerqua A., Pellegrini G., “Do subsidies to private capital boost firms’ growth? A multiple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approach”,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4, 109.

[19] Bernini C., Cerqua A. et al., “Public subsidies, TFP and efficiency: A tale of complex relationships”, *Research Policy*, 2017, 46(4).

[20] Criscuolo C., Martin R. et al., “The Causal Effects of an Industrial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9, 109(1).

[21] Yi, F., C. Y. C. Lin Lawell, and K. E. Thome., “The Effects of Subsidies and Mandates: A Dynamic Model of the Ethanol Industry”, *Working Paper*, Cornell University, 2017.

[22] Cohen 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industrial policy”, *EIB Papers*, ISSN 0257 - 7755, 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EIB), Luxembourg, 11(1).

[23] 张杰、翟福昕、周晓艳:《政府补贴、市场竞争与出口产品质量》,《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年第4期;李旭超、罗德明等:《资源错置与中国企业规模分布特征》,《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24] [美]戴维·瓦尔德纳:《国家建构与后发展》,刘娟凤、包刚升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第127页。

[25] [美]达龙·阿西莫格鲁:《制度视角下的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比较》2014年第74期。

[26] de Ferranti D., Perry G. E. et al., *From Natural Resources to the Knowledge Economy: Trade and Job Quality*, World Bank, 2002.

[27] Hatta T., “Competition policy vs. industrial policy as a growth strategy”, *China Economic Journal*, 2017, 10(2).

[28] Chu W., “Industry poli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multi-layered model”, *China Economic Journal*, 2017, 10(3).

[29] 尹玉婷、卢现祥:《我国财政补贴的配置效率与适应性效率分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1期。

[30] 顾昕:《协作治理与发展主义:产业政策中的国家、市场与社会》,《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10期。

[31] 卢现祥、尹玉婷:《中国人际关系化产业补贴的有效性分析》,《江汉论坛》2018年第5期。

[32] Levy B., “Transactions costs, the size of firms and industrial policy: Lessons from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the footwear industry in Korea and Taiwan”, 1991, 34.

[33] 参见[美]查默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奇迹》,唐吉洪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

[34] Richard Boyd:《日本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寻租模式及其经济后果》,《公共管理评论》2005年。

[35] 参见[美]路易吉·津加莱斯:《繁荣的真谛》,余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

[36] Mao J., Tang S. et al., “China as a ‘Developmental State’ Miracle: Industrial Policy,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SSRN, 2017.

[37] 余明桂、回雅甫等:《政治联系、寻租与地方政府财政补贴有效性》,《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

[38] 参见[美]道格拉斯·C. 诺思、约翰·约瑟夫·瓦利斯等:《暴力与社会秩序:诠释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杭行、王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39] Rodrik D., “Industrial polic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4767*, 2005.

[40] 杨洋、魏江等:《谁在利用政府补贴进行创新?——所有制和要素市场扭曲的联合调节效应》,《管理世界》2015年第1期;张杰、陈志远等:《中国创新补贴政策的绩效评估:理论与证据》,《经济研究》2015年第10期;余明桂、范蕊等:《中国产业政策与企业技术创新》,《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12期。

[41] 邵敏、包群:《政府补贴与企业生产率——基于我国工业企业的经验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7期;Aghion P., Cai J. et al., “Industrial Policy and Competit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015, 7(4).

[42] Robinson J. A., “Industri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 A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The 2009 World Bank ABCDE conference*, Seoul, 2009. 参见[美]达龙·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 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李增刚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

[43] 刘海洋等:《补贴扭曲了中国工业企业的购买行为吗?——基于讨价还价理论的分析》,《管理世界》2012年第10期。

[44] 江飞涛、李晓萍:《直接干预市场与限制竞争:中国产业政策的取向与根本缺陷》,《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9期。

[45] 王永进、冯笑:《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企业创新》,《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2期。

[46] Yueh L., *Enterprising China: Business, economic, and legal developments since 197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47] 肖兴志、王伊攀:《政府补贴与企业社会资本投资决策——来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验证据》,《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9期。

[48] Feldman M. P., Kelley M. R., “The ex ante assessment of knowledge spillovers: Government R&D policy, economic incentives and private firm behavior”, *Research Policy*, 2006, 35(10); 伍健、田志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科学学研究》2018年第1期。

[49] Acemoglu D., Institutions, “Factor Prices and Taxation; Vir-

tues of Strong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0, 100(2).

[50] 参见[美]道格拉斯·C. 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杭行译, 上海: 上海格致出版社, 2014年。

[51] 陈永清、夏青等:《产业政策研究及其争论述评》, 《经济评论》2016年第6期; 毛其淋、许家云:《政府补贴、异质性与企业风险承担》, 《经济学(季刊)》2016年第3期。

[52] Boeing P., “The alloc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R&D subsidies – Evidence from listed firms”, *Research Policy*, 2016, 45(9).

[53] Boeing P., Mueller E. et al., “China’s R&D explosion—Analyzing productivity effects across ownership types and over time”, *Research Policy*, 2016, 45(1).

[54] 邓若冰、吴福象:《研发模式、技术溢出与政府最优补贴强度》, 《科学学研究》2017年第6期。

[55] 王刚刚、谢富纪等:《R&D 补贴政策激励机制的重新审视——基于外部融资激励机制的考察》, 《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2期。

[56] Mariko S., Cho D., “Cooperative R&D in Japan and Korea: a comparison of industrial policy”, *Research Policy*, 2002, 31(5).

[57] Acemoglu D., Akcigit U. et al., “Innovation, Reallocation and Growth”, *NBER*, 2013.

[58] 汪秋明、韩庆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政府补贴与企业行为——基于政府规制下的动态博弈分析视角》, 《财经研究》2014年第7期。

[59] 周亚虹、蒲余路等:《政府扶持与新型产业发展——以新能源为例》, 《经济研究》2015年第6期。

[60] Hu A. G. Z., Zhang P. et al., “China as number one? Evidence from China’s most recent patenting surg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7, 124.

[61] Chen J., Heng C. S. et al., “The distinct signaling effects of R&D subsidy and non-R&D subsidy on IPO performance of IT entrepreneurial firms in China”, *Research Policy*, 2018, 47(1).

[62] Kalouptsi M., “Detection and Impact of Industrial Subsidies: The Case of Chinese Shipbuilding”,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8, 85(2).

[63] 孔东民、刘莎莎等:《市场竞争、产权与政府补贴》, 《经济研究》2013年第2期。

[64] 宋凌云、王贤彬:《产业政策如何推动产业增长——财政手段效应及信息和竞争的调节作用》, 《财贸研究》2017年第3期。

[65] Wei S., Xie Z. et al., “From ‘Made in China’ to ‘Innovated in China’: Necessity, Prospect, and Challeng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7, 31(1).

[66] 孟辉、白雪洁:《新兴产业的投资扩张、产品补贴与资源错配》,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年第6期。

[67] Blonigen B., “Industrial Policy and Downstream Export Performance”, *NBER*, 2013.

[68] 陈小亮、陈伟泽:《垂直生产结构、利率管制和资本错配》, 《经济研究》2017年第10期。

[69] 徐志伟、郭树龙:《政府补贴、市场进入与企业盈利——兼评政府补贴的技术效应与反竞争效应》, 《当代财经》2018年第1期。

[70] 江飞涛、曹建海:《市场失灵还是体制扭曲——重复建设形成机理研究中的争论、缺陷与新进展》, 《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1期。

[71] 江飞涛、耿强等:《地区竞争、体制扭曲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 《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6期。

[72] 卢现祥:《对我国产能过剩的制度经济学思考》,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8期。

[73] 黄先海、谢璐:《战略性新兴产业 R&D 补贴的实施策略研究——事前补贴与事后补贴之比较》, 《国际贸易问题》2007年第11期。

[74] 郑绪涛、柳剑平:《促进 R&D 活动的税收和补贴政策工具的有效搭配》, 《产业经济研究》2008年第1期。

[75] Junichi N., Hiroyuki O., “Subsidy and networking: The effects of direct and indirect support programs of the cluster policy”, *Research Policy*, 2011, 40(5).

[76] Hiroyuki O., Junichi N., “Whose business is your projec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different subsidy policy schemes for collaborative R&D”,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8, 127.

[77] 熊勇清、李晓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财政补贴方向: 供给端抑或需求端——以光伏产业为例》, 《审计与经济研究》2015年第5期。

[78] Bérubé C., Mohnen P., “Are firms that received R&D subsidies more innovativ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 42(1).

[79] 唐书林、肖振红等:《上市公司自主创新的激励扭曲之困——是政府补贴还是税收递延?》, 《科学学研究》2016年第5期。

[80] 柳光强:《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的激励效应分析——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视角的实证研究》, 《管理世界》2016年第10期。

[81] Nie P., Wang C. et al., “Comparison of energy efficiency subsidies under market power”, *Energy Policy*, 2017, 110.

[82] 张辉、刘佳颖等:《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门槛分析》, 《经济动态》2016年第12期。

[83] Hausmann R., Rodrik D.,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Self Discover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2, 72(2).

[84] 黄先海、宋学印等:《中国产业政策的最优实施空间界定——补贴效应、竞争兼容与过剩破解》, 《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4期。

[85] 吴敬琏:《我国的产业政策: 不是存废, 而是转型》, 《中国流通经济》2017年第11期。

[责任编辑: 刘 鏊]